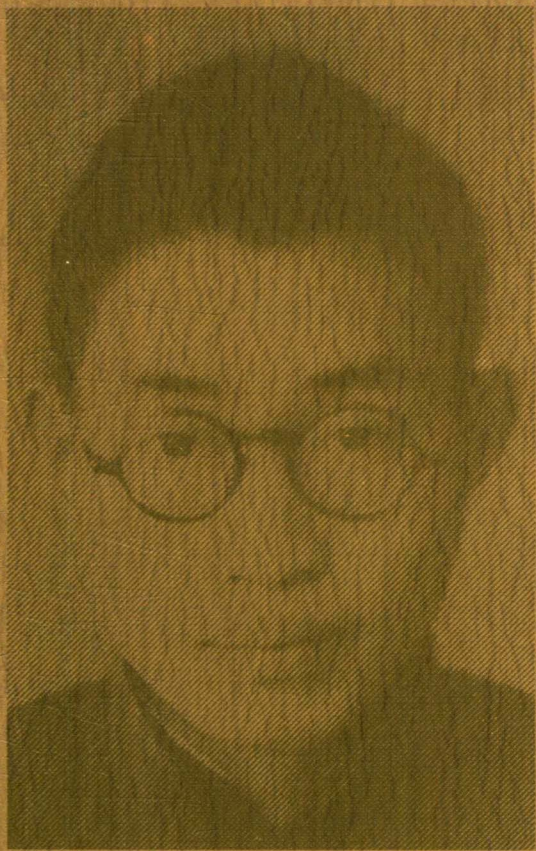


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丛书（第一辑）
新闻史人物研究系列 | 倪延年 主编



报人与专家： 新闻人胡道静研究

关 梅 著

师范大学出版社
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13AXW003）资助

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丛书（第一辑）
新闻史人物研究系列 | 倪延年 主编

报人与专家： 新闻人胡道静研究

关 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人与专家:新闻人胡道静研究 / 关梅著. —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1
(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丛书. 第一辑, 新闻史人物研究系列)

ISBN 978-7-5651-3572-9

I. ①报… II. ①关… III. ①胡道静(1913—2003)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2532 号

丛 书 名	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丛书(第一辑)
主 编	倪延年
书 名	报人与专家:新闻人胡道静研究
作 者	关 梅
责任编辑	李思思 于丽丽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西村 9 号(邮编:210016)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中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49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3572-9
定 价	39.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序 言

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新闻史学是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属于专门历史学的范畴。新闻事业主要由新闻信息、新闻人、新闻媒介及新闻活动等要素构成。对新闻事业要素发生、发展和变化历程的研究是新闻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丛书》(第一辑)就是由4种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史人物的专著组成的专题性学术丛书。

—

“十朝都会”南京是孙中山1912年元旦领导创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从1927年4月18日起成为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主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6年11月“国民大会”后改称“中华民国总统府”)所在地。^①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南京成为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24年4月1日开始发稿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1927年5月移至南京,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1928年8月1日在南京开始播音;几经变迁的《中央日报》也于1929年2月1日正式在宁出报,其他新闻媒介也纷纷在南京创办或靠拢。自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数年间,南京及周边地区的新闻事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心地带,因而也成为民国时期新闻事业相关文献史料收藏和保存比较集中的地方,在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史方面具有不可多得的地理和文献优势。

南京师范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尤其是高等师范教育史上是一所具有百余年历史和重要影响的学校,其历史可上溯至1902年由清末名臣张之洞奏请

^① 日本侵略军1937年11月12日攻陷上海,民国南京政府国防最高会议1937年11月16日“议决迁都重庆”。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凯旋令,“定于5月5日国民政府自陪都重庆凯旋南京”。

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师范大学的新闻专业教育起源于国家教育部于1964年批准的在当时的南京师范学院政教系设立的新闻专业。后因国家暂时经济困难停止招生。1977年恢复高考时在中文系招收新闻专业本科生。1995年成立了由新闻系、广播电视新闻系、广告学系、现代教育技术学系组成的新闻与传播学院，2012年增设网络与新媒体系。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努力，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的学子遍布大江南北、北上广深。2001年获准设立新闻学和传播学硕士学位授权点，2006年获准设立新闻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2018年获准设立新闻与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被学界同行专家誉为“进入全国新闻教育第一方阵”。

2012年5月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在此基础上，学校于2014年4月成立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是国内第一个以民国时期新闻史为研究对象和主题的学术研究机构，拥有本校在职教师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京政治学院、新华通讯社等单位的民国新闻史专家相结合的研究队伍；同时也是一个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开放互动型专业研究机构，分别于2014年、2015年、2016年和2018年承办，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一、二、三、四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从第一届开始就有来自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主动撰文、踊跃参会进行学术交流，此后的数届则有来自法国、英国及我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区的学者参加学术交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秘书处设在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并编印信息通报性内部刊物《民国新闻史研究动态》，同时在组织第一、二、三届“民国新闻史高层论坛”过程中，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以应征论文为主要内容的《民国新闻史研究：2014》《民国新闻史研究：2015》和《民国新闻史研究：2016》年度学术集刊。

南京师范大学百余年深厚的文化底蕴，新闻与传播学院几代人数十年的治学传统，以及海内外众多专家的鼎力支持和赐教，为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开展研究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持和保障。

二

研究民国新闻史应该也必须把当时的新闻史人物、新闻媒介、新闻事件及新闻活动放到特定的社会环境里进行认识和分析，才能比较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民国时期的新闻史人物、新闻媒介及新闻史人物在媒介上说过的话和在新

闻活动中做过的事。民国时期社会环境的主要特点是：

1. “两半”社会性质依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及国家(政府)运作形态定型于清末。孙中山领导创建了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虽然标志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王朝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诞生,但仍然没有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书》中声明:“凡革命前清廷与各国所订条约、所借外债、所认赔款及让与各国或个人之种种权利,民国均予以承认、保护。”抗战胜利后,美国在中国设有军事顾问团,派遣数万海军陆战队驻扎中国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和秦皇岛等地。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含驻华美军)签订的《中美警宪联合勤务协定》《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空中运输协定》“友好互惠”协定,使美国人仍实质享有治外法权和各种特权:美国商品在中国享有与中国商品征税、销售同等的待遇;美国船舶可在中国“开放之一切口岸、地方及领水内”自由航行;美国军舰在“危难”时可开进中国任何不开放的“口岸、地方或领水”;美国飞机可在中国领空随意飞行,并在上海“及以后随时同意之地点”作“非交通性的停靠”。可见当时的中国政府虽然是存在的,但美国人是不能得罪的。

2. 国民党处于强势地位。由于在推翻清朝统治斗争中的历史贡献,中国同盟会主导了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运作。中国同盟会在民国北京政府及其众议院、参议院乃至全国政坛中仍是重要政治力量。在“二次革命”、成立护法军政府和非常大总统府、在苏联支持下和共产党合作开展反帝反封建“大革命运动”等重大事件中,国民党都一直掌握着中国政治运动的主导权。国民党新军阀首领蒋介石成立民国南京政府后,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占据政治道德优势,借助庞大的军警宪特建立了“一党为大”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国际上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华民族的代表,并由于中华民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在“二战”结束后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因拥有全国社会、行政和自然资源。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抗战后国共谈判中,国民党都长期处于强势和执政的地位。

3. 共产党处于弱势地位。“大革命”运动中,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整体和个体”与“主导和参与”关系十分明显。“国共合作”抗日应是平等的,但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说,“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一是“政府开诚接纳”,二是“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完全是“政府对民众”“领导党对被领导党”姿态。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蒋介石三次邀请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签署的是《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

要》，国民党是“政府”方，中共是党派“代表”。直到解放军展开战略反攻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

4. 外国势力影响中国政治。民国时期对中国政治局势影响最大的是资本主义的英美、军国主义的日本及社会主义的苏联。日本在民国时期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武装侵略，扶植的汉奸政府为虎作伥。中华民族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终于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蒋介石国民党集团重要官员的主要教育和从政背景加之第一夫人家族的特殊影响，使国民党政府成为“二战”结束初期美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接受者。作为报答，国民党政府成为美国对抗苏联的“铁杆随从”，中华民国成为美国军队的最大驻外国及战后剩余商品的倾销市场。社会主义苏联是既复杂多变又直接影响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列宁领导的苏联先后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发表两次“对华宣言”，宣布“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等权利，积极支持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大革命”。国共分裂蒋介石转向英美后，苏联因与共产党意识形态一致而支持共产党。抗战时期，苏联既和日本订有《苏日中立条约》，又和民国南京政府保持外交关系；对抗战胜利后中共军队在东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又给予重要的帮助。

5. 舆论影响政治走向。民国时期的民心及舆论力量来源，第一是辛亥革命运动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日益普及的知识分子群体及上层精英人士认可并追求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西方资产阶级观念；第二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底层民众之中的社会应公平合理，人与人平等相待，没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民众享有人格尊严和安定生活，外敌入侵时一致对外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生存的传统文化精神；第三是世界各国主持正义人士反对强国欺凌弱国、侵犯别国主权和损害领土完整，反对侵略战争和支持反侵略战争的立场和呼声。这些方面的民心和舆论力量都对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上述各方因素，无一不对民国时期活跃在新闻界的各色人物产生明显而直接的影响，既成为他们表演人生“活报剧”的舞台或背景，也是我们研究民国时期新闻史人物应该考虑的时代或社会因素。

三

在构成民国时期新闻事业的新闻人、新闻内容、新闻媒介、新闻活动等诸

要素中,新闻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并制约其他因素的核心因素。评价民国时期新闻史人物或新闻媒介,既不能割断其与阶级阵营、政党意识和学术派别的关系,也不能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研究模式,更不能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和观点,从不同维度进行评价。

首先是“国家观念”的维度。“国家”除了具有“阶级的统治机关”的政治涵义外,还指“有疆域、人民、独立地位和主权的不同地区的政治实体”,而且在大多数人看来,“政府”和“国家”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爱“国”不等于爱“政府”。只要新闻史人物或其掌握的新闻媒介的新闻活动有利于国家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及国防巩固,即对于“国家”有促进或补益作用,就应该肯定他们的历史性贡献。用“国家观念”衡量,多数民国新闻史人物的新闻活动都应该得到肯定——至少在客观上为“国家利益”尽了“书生报国”“新闻救国”的责任。

其次是“民族利益”的维度。“民族利益”是指“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利益的总和”。维护“民族尊严”是保护“民族利益”的重要内容。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考验面前,大多数民国时期新闻人格守“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民族气节和坚持反对外敌侵略的新闻活动应得到充分肯定。

再则是“社会道德”的维度。新闻传播活动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新闻史人物只要在其新闻活动中宣传弘扬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崇敬文明、注重秩序、尊重多元、平等待人、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尊老爱幼、崇尚节俭等主流传统社会优良道德,并以其实际行动和效果对社会良好道德风貌的形成发挥积极意义,利于正常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稳定,就应该予以积极的肯定。

最后是“行业贡献”的维度。“行业贡献”是指新闻史人物对新闻基础理论、专业实践及行业技术等社会性进步做出的贡献。用“行业贡献”的标准衡量,所有在民国时期对新闻行业的人才培养、技术进步、实践经验、新设备和技术引进及应用等方面具有开拓意义和促进作用的言论行为都应得到肯定。

另外还有“阶段表现”的维度。“阶段表现”是指在对新闻史人物进行评价时,应对其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新闻活动的“是”或“非”进行阶段区别性的记载和评价。我们认为,即使对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分道扬镳,后来成为“托派”领袖,并亲自创办“托派”报刊鼓吹“二次革命”且拒不认错的陈独秀,也应客观评价其在共产党创建前创办《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客观评价他在参与创建共产党并在共产党成立后领导创办《向导》等中共机关报并初步形成中共党报体制等活动中的历史性贡献。

四

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是全国新闻史学界及其他领域民国新闻史研究专家学者的共同学术平台。其研究对象涵盖民国时期新闻事业的全部要素,包括新闻史人物研究、新闻媒介研究、新闻事件研究、地方新闻事业研究及其他专题性研究等多个方面。其研究成果将以《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现在呈现给读者诸君的就是4种以民国时期新闻史人物为研究对象和主题的著作组成的《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丛书》(第一辑)。

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4种著作研究的对象即传主有一个“共性”,即都与“民国时期”有关。无论是胡道静、黄天鹏,还是马星野和林语堂,他们的新闻活动主要是在民国时期。他们各人的经历和奋斗,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环境下不同经历和个性的新闻人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及特定社会环境在每一个新闻人身上打下的“时代印记”。

其次,这些著作研究的4位传主的人生道路和思想轨迹都经历了不同的转变。胡道静的新闻活动从积极主张抗日转向追求政治民主。黄天鹏从汕头报馆福建特派记者起步,后官至“国大代表”兼任宪政督导委员会委员。马星野从新闻学教师到实际主持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又成为《中央日报》社长,其新闻思想经历了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到“国家民族至上”的“三民主义”,再到“蒋公语录”阐释下的现代大众传播思想的发展历程。林语堂则经历了先是“横眉怒对”北洋军阀刀枪的“语丝派”,后转为提倡“幽默”“闲适”但对现实进行明讽暗批的“论语派”,又在抗战时期成为积极“抗日派”的转变过程。当然各位传主转变的轨迹又各具“个性”。

再则,这4位作者都是年轻的新闻史研究者,都在高等学校从事新闻传播教学研究,也都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的新闻史学方向博士。他们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仍要完成规定的教学研究工作量;或在学习时担任学校管理部门负责人;或在学习时继续讲课当辅导员的同时还当了妈妈;或是因脱产读书而必须外出兼课以减轻经济压力;等等。但欣慰的是他们都克服了困难,如期完成了学位任务。他们能够专注特定新闻史人物“打深井”,尽可能搜集相关史料并认真研读,探讨他们所处社会环境与人生道路的关系,解剖“这一个”人物的人生轨迹、新闻经历、思想变化、贡献和遗憾,力图考证展现一个比较客观、真实和完整的“他”。

最后,“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又因这些著作研究的是“民国时期”新闻史人物,而这些年轻的著者们却不可能有机会亲身经历和体会民国时期新闻史人物所处的“那个”时代,加之各人学术积累和对研究对象认识程度的差异、不同研究对象相关文献史料搜集和研读难度的不同,当然也受到导师学识水平的局限,所以收入《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丛书》(第一辑)中的这些著作难免有多方面的不足。好在他们是一群年轻人,且是一群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相信他们会通过不断努力达到不断完善的目标。

是为序。

倪 延 年

二〇一八年九月三十日于师大随园
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

前言

1956年,胡道静出版了《梦溪笔谈校正》一书,这部著作一举奠定了他在我国当代科技史学界的地位。然而,就是这位著名的科技史专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经从事新闻实践活动和新闻学研究达15年之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不仅是一位在外敌入侵的战争环境下毅然投身抗日救亡新闻界、由“文化学者”转变为“新闻战士”的爱国、进步新闻人,也是一位在我国新闻学研究尤其是地方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笔者认为,作为“民国新闻人”的胡道静所取得的成绩与作出的贡献在那个时代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完全不应该被他在科技史领域的研究成就所掩盖;同时,作为新闻学界的后人,我们也有责任对这位新闻学界的前辈在新闻领域的实践与著述进行探讨与研究,以期清晰地勾勒、评价“民国新闻人胡道静”的历史轨迹与学术贡献。

本书属于个案研究,主要以胡道静的新闻实践活动和新闻学研究活动为主线展开论述。首先是对胡氏家族文化背景、胡氏先辈报刊活动及胡道静求学之路的回顾与梳理,其目的是揭示胡道静走上抗日救亡新闻前线的外在和内在动因以及展现胡道静在上海通志馆开始新闻学研究的最初情况。第三章,是按照时间顺序研究胡道静从1938年4月主编《通报》至1948年10月《正言报》被查封这段时间里的新闻实践活动,具体又分为抗战时期的新闻活动和抗战胜利后的新闻活动两个阶段。通过对胡道静新闻实践活动的回顾与相关报纸的内容分析,还原其作为一个争取民族解放和追求民主自由的爱国、进步新闻人的新闻实践历程。第四章,是按照研究内容的不同具体呈现和分析胡道静的新闻学研究活动,其中胡道静的新闻史学研究是本章的核心内容。在对胡道静的新闻史学研究、新闻理论及实务研究的相关著述进行研读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胡道静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视角和观点,进而归纳出胡道静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特征。最后,笔者尝试对“民国新闻人胡道静”的历史贡献进行总结和评价。胡道静的历史贡献也是他新闻学研究中的独特之处,而这些及其所折射出的学术精神“隐喻”对当

代新闻学研究者也颇具启发与影响。

本书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和研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观点和评价。因此，在出版过程中，本书对所引用的史料都尽可能保持其原貌。在本书写作期间，适逢《胡道静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的出版，这一为纪念胡道静先生诞辰百年而出版的七卷本的学术文集，内容丰富翔实，时间跨度之大，几乎涵盖了胡道静一生在其所涉猎领域的所有研究成果，这也为当时笔者的撰写提供了史料上的参考和帮助。当然，即便如此，本书在修改、完成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存在一些史料及观点上的不足，也希望能就此求教于新闻学界的前辈和同仁，以更好地完善对“民国新闻人胡道静”的研究。

关梅

2017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	1
一、研究理由	1
二、研究意义	4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5
一、研究方法	5
二、创新之处	6
第三节 文献述评	8
一、文献综述	8
二、文献评价	15
第二章 胡道静新闻学研究的家庭背景和开端	17
第一节 胡道静新闻学研究的家庭背景	17
一、胡氏家族的文化遗产与治学思想	17
二、胡氏先辈的报刊活动	20
三、胡道静的求学生涯	21
第二节 胡道静新闻学研究的开端	25
一、胡道静新闻学研究的出发地——上海通志馆	25
二、胡道静第一篇新闻学论文：《一九三三年的上海杂志界》	28
三、胡道静走上新闻学研究之路的原因	31
第三章 胡道静的新闻实践活动研究	34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新闻实践活动(1938—1945年)	34
一、“孤岛”时期的社会背景及新闻界概况	34
二、胡道静新闻实践活动的开始——主编《通报》	39
三、从参与培养抗日新闻人才到在大中通讯社编译新闻稿件	47
四、“孤岛”时期的最后奋斗：在《中美日报》和《大晚报》	49
五、避难浙皖：在《东南日报》(金华版)和《中央日报》(屯溪版)	54

第二节 抗战胜利后的新闻实践活动(1945—1948年)	64
一、抗战胜利与《正言报》的复刊	65
二、《正言报》的来龙去脉	66
三、胡道静担任《正言报》总编辑及时间考证	71
四、“转向另一条道路的批评者”——《正言报》之言论分析	74
第三节 胡道静新闻实践活动的主要特征	97
一、身为爱国新闻人,为实现民族独立而坚持奋斗	98
二、身为进步新闻人,为追求民主自由而大声疾呼	99
三、身为职业新闻人,注重新闻活动规律	101
第四章 胡道静的新闻学研究	103
第一节 胡道静的新闻史学研究	103
一、胡道静新闻史学研究的历史背景	103
二、胡道静新闻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108
第二节 胡道静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研究	142
一、对人类早期新闻传播活动起源的探索	142
二、对“新闻”相关概念的理论辨析	145
三、新闻采访与写作规律的深入研究	147
四、关于科学技术与新闻事业发展之关系	150
第三节 胡道静新闻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154
一、以成就一部“良好的新闻史”为研究目标和动力	154
二、重视对上海地方新闻史的系统研究	158
三、精心设计并实施系列个案研究	160
四、注重科学技术对新闻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161
第五章 新闻人胡道静的历史贡献及现代隐喻	164
第一节 新闻人胡道静的历史贡献	164
一、初步构建了上海地方新闻史研究的框架体系	164
二、第一个预言“电视新闻”时代即将到来	168
三、为后人研究上海新闻史保存了珍贵的史料	174
第二节 新闻人胡道静的现代隐喻	176
一、新闻人必须具有忧国忧民、为民请命的社会责任心	176
二、新闻史学研究必须注重开拓选题及理论体系的创新	179
三、新闻史学者必须具有科学的研究观念	183
四、新闻史学研究既需要踏实苦干又需要广开眼界	187

结 语.....	191
附录 胡道静新闻实践和新闻学研究大事记(1932—1949 年)	193
参考文献.....	201
一、报刊资料	201
二、胡道静著述	201
三、其他著作	202
四、期刊论文	206
五、学位论文	210
后 记.....	211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胡道静(1913—2003),安徽泾县人,因为出版《梦溪笔谈校正》被公认为我国当代著名的科技史和古典文献专家。然而在 20 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他的主要活动和贡献却是在新闻领域。在这一方面,长期以来没有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尤其是新闻学界的应有重视。

一、研究理由

胡道静从 1938 年在上海“孤岛”参加抗日新闻宣传活动直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先后在《通报》、《东南日报》(金华版)、《中央日报》(屯溪版)、《正言报》等多份报纸中担任编辑职务,同时还参与了“大中通讯社”、《中美日报》、《大晚报》等媒体机构的新闻采访和编译工作,在时局动荡、颠沛流离的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并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和追求民主自由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出版了《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通志馆,1935 年)、《上海的日报》(上海通志馆,1935 年)、《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通志馆,1935 年)和《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 年)等四部新闻学研究专著;另有近百篇新闻学研究论文发表在《中美日报·集纳版》《大美晚报·记者座谈》《大晚报·上海通》《战时记者》和《报学杂志》等刊物上。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世界及中国报纸的起源与发展、重要报纸的个案研究、在华外报情况、中国报纸副刊的起源与发展、通讯社的功能及中外通讯社的发展、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新闻业务的发展与变化、上海地方新闻

史研究等方面,胡道静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我国新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①笔者认为,开展本研究有如下理由。

(一) 胡道静是持续十多年研究我国地方新闻史的代表人物之一

地方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受到社会文化条件、经济环境、交通情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地方新闻事业在最初发展阶段就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这是我国最早的新闻史专著,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新闻史著作。此后一直到1949年,先后出版的地方新闻史著作主要有项士元的《浙江新闻史》(1930年)、李抱一的《长沙报纸史略》(1931年)、胡道静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1935年)、管雪斋的《武汉新闻事业》(1936年)、长白山人的《北京报纸小史》(1941年)、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1943年)等。不难看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受到社会动荡环境的影响,再加上我国整体新闻学研究都正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关于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且研究的系统性与深入性也有待提高。相比较而言,胡道静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则更多地体现出研究者对上海新闻事业(当然主要是上海报业)纵向发展的审视与思考,时间跨度达80年之久(从1850年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至20世纪40年代,胡道静围绕上海新闻事业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形成了一个连续的上海新闻史研究脉络,这使得胡道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地方新闻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二) 胡道静是上海新闻史研究体系的构建者

胡道静的《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的日报》和《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等著作以及一些研究文章均以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及现状为研究对象,在时间和空间的双向考察维度中初步构建了上海新闻史的研究框架与体系。

首先,胡道静的著作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上海新闻史研究内容体系。胡道静对上海新闻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的相关著述在研究内容上既有对历史的梳理,也有对现实的关注,两个方面纵横结合、互为联系和补充,从而构建起了一个从历史到现实,包括上海报业、杂志业、新闻广播业、新闻通讯业以及新闻教育和研究团体等内

^① 徐培汀. 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11)提到现代著名的新闻史学家,仅列举两位即戈公振和胡道静。